

中國寫本大藏經

研究

方廣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寫本大藏經 研究

方廣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 / 方廣錫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25-4510-5

I. 中... II. 方... III. 大藏經—研究 IV. B9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02260 號

責任編輯 吳長青

封面設計 嚴克勤

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

方廣錫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20.875 插頁 5 字數 504,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300

ISBN 7-5325-4510-5

B·574 定價: 6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序

本書是《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的第二次增補修訂本。此次出版，改名為《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原因如下：

第一、“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是中國佛教大藏經的發展階段之一，當時的大藏經主要是寫本，但刻本已經出現。本書僅論述寫本，因此，“寫本大藏經”這一名稱更準確。

第二、浸潤於佛教研究近 30 年，越來越覺得大藏經研究也是一個博大精深的領域。當時年輕，不知深淺，輕率地用“史”作為書名；現在雖然不能說已經完全摸清底細，但起碼進一步加深了對這一領域的了解，所以改用“研究”，以使名實相符。

第三、本書雖仍以八——十世紀寫本藏經為主要研究對象，但不少內容已經溢出“八——十世紀”這一時代限定。且改名為“研究”後，“八——十世紀”這一限定語可以刪除。

第四、寫本大藏經，廣泛流傳於漢傳佛教圈。比如日本的寫本大藏經傳統，一直延續到十七——十九世紀的江戶時代，比中國還長。因此前冠“中國”，以示限定。

在此對本書的修訂情況作一個簡要的交代。

本書最早為我的博士論文，原名《八——十世紀的中國漢文寫

本大藏經》，完成於1988年。修訂後於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改名《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2000年增補、修訂後收入臺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的《法藏文庫》，書名未變，有關增訂情況，我曾撰寫序言予以交待，但編輯者將該書社科版序、跋，連同新寫的序言刪除未刊。爲了存真，此次將上述社科版序、跋，爲《法藏文庫》版所寫之序作爲附錄，一併附於書末。本書社科版原有“英譯本自序”一篇，但因英譯本最終並未完成，且完成無期。故此次將其刪略，以免繼續誤導讀者。

本書在《法藏文庫》版的基礎上再次增補、修訂而成。較大的增訂有：撤銷卷首的“寫本大藏經史略（代導言）”，改爲“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代導言）”。在新的代導言中，我對漢文大藏經提出新的定義。提出大藏經從產生至今，可以分爲四個時期。主張將本書研究的寫本大藏經分爲六個階段。對每個時期、每個階段漢文大藏經的特點，作了簡要的論述。在第二章第三節中，增加了關於“《慧琳音義》與唐代大藏經”的討論。在第三章中，增加了“敦煌地區大藏經的《開元錄》時期”一節。增設第五章，主要研究大藏經的功能形態。該章分兩節，第一節著重探討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這一個案，第二節對古今大藏經的功能形態及其演變、相互關係進行理論探討。此節與代導言一樣，都屬於對大藏經的理論研究。近代以來，中外對大藏經的研究，往往偏重於考據，希望將來在理論開拓方面能有所加強。增設第六章，列入原來的附錄《〈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復原擬目》。當初編撰這一《擬目》，主要是想追索《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的原貌；附加千字文祓號，以體現晚唐五代正統《開元大藏》的面貌，進而說明後代大藏經中所收的《開元釋教錄略出》祇是一個變種。但在其後的科研實踐中，發現這個擬目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工具書，可以作爲鑑定晚唐五代佛教寫本大藏經的依據。因此將它專列爲一章。此外在全書的其他不少地方，都有一些增補與

修訂。

社科版出版已十餘年，早已脫銷。《法藏文庫》版流通不廣，較難看到。這些年在國內外，經常遇到一些研究者向我打聽何處可以購買此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王興康社長、府憲展先生的善意，使本書得以增訂再版。出版前，侯沖協助核對全部引文；張麗對文字與標點作了修飾。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寫本大藏經是佛教大藏經的源頭，在佛教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書雖然做了一些研究，並在不斷的修訂中深化這方面的研究，但現在看來，在寫本大藏經領域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並相信這一領域不斷會有新的成果面世。本書雖然不斷修訂，但錯謬之處依然難免。希望得到諸方指教，以共同推進寫本大藏經的研究。

2006年3月15日於通州皇木廠

目 錄

序	1
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代導言)	1
一、“大藏經”名稱考	2
二、大藏經的定義	5
三、大藏經的分期標準	11
四、大藏經的分期及不同時期大藏經的特點	13
第一章 《開元錄》對大藏經結構的貢獻	39
第一節 智昇與他的《開元錄》	39
第二節 《開元錄》對漢文大藏經結構的貢獻	45
第二章 從《開元錄》到會昌廢佛的大藏經	71
第一節 皇家官藏	76
一、皇家官藏概述	76
二、從《開元錄》到會昌廢佛的皇家官藏	90
三、皇家的干預與大藏的形成	104
第二節 敦煌地區的漢文大藏經	118

一、本節的考察時限	118
二、敦煌漢文大藏經與《內典錄·入藏錄》	120
三、敦煌龍興寺	132
四、再論敦煌佛藏與《內典錄》的關係	141
五、《吐蕃統治時期敦煌龍興寺藏經目錄》研究 ...	145
附錄：《吐蕃統治時期敦煌龍興寺藏經目錄》	157
六、大錄內無名典籍	193
七、小結	209
第三節 其他地區的漢文大藏經	210
一、圍繞大藏經的各種宗教活動	210
二、漢文大藏經的各種表現形態	222
三、《慧琳音義》與唐代大藏經	279
四、關於西土及唐國佛藏的傳說	296
五、小結	316
第三章 會昌廢佛後的大藏經	317
第一節 會昌廢佛時佛典的損毀	317
第二節 會昌廢佛後的漢文大藏經	325
一、廢佛後佛典的恢復	325
二、會昌廢佛後的皇家官藏	327
三、會昌廢佛後的各地藏經	336
四、北敦 14676 號研究	348
第三節 《沙州乞經狀》研究	368
第四節 敦煌地區大藏經的《開元錄》時期	394
第四章 漢文大藏經秩號考	403
第一節 千字文秩號非智昇所創	403
一、問題的提出	403

二、《開元錄略出》非智昇所撰	408
三、千字文袂號非智昇所創	415
四、《開元錄略出》的性質	417
第二節 漢文大藏經袂號探源	419
一、經名標誌法與經名袂號法	419
二、定格貯存法	435
第三節 吐蕃統治時期敦煌流行的偈頌袂號法	441
一、偈頌袂號法介紹	441
二、偈頌袂號研究	448
附錄：敦煌遺書伯 3010 號錄文	456
第四節 千字文袂號	477
一、會昌廢佛之前無千字文袂號	477
二、《續開元錄》中千字文袂號考辨	483
三、敦煌遺書中的千字文袂號	494
四、千字文袂號的產生與流傳	510
第五章 寫本藏經的形態	514
第一節 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研究	514
一、簡況與錄文	514
二、出土地點	529
三、產生年代	530
四、藏經形態	532
五、千字文袂號問題	535
六、統一過程中的分化問題	535
第二節 大藏經的功能形態	536
一、義理型大藏經	537
二、信仰型大藏經	540

三、備查型大藏經	544
第六章 《開元錄·入藏錄》復原擬目	547
主要參考書目	641
附錄	
一、任繼愈：社科版序	645
二、方廣錫：社科版跋	649
三、方廣錫：法藏文庫版序	654

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

(代導言)

對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歷來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以大月氏使臣伊存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說較為可信。伊存雖尊印度傳統口授，景盧却依中國習慣筆錄。因此，這部《浮屠經》是第一部成文的漢譯佛經。^①也就是說，佛典的傳入與佛教的傳入最初是同步的。

後來，西域僧衆東來傳教，中國僧衆西行求法。佛經陸續譯出，中華佛教撰述也不斷涌現。佛教在中國由附庸，到獨立，最終成為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這一進程相呼應，漢文佛典也逐漸發展、成長，最後形成一部龐大的大藏經。大藏經雖是漢文佛教典籍，卻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音韻、天文、地理、曆算、醫學、建築、繪畫、科技、民族、社會、中外關係等諸多領域。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對中國文化及整個漢文化圈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也是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

① 參見方廣錫：《〈浮屠經〉考》，載《法音》，1998年第6期。

一、“大藏經”名稱考

“大藏經”是中國人創造的佛教名詞，在梵文中找不到與此相對應的原詞。

“大”，在這裡是一種褒義，它表示佛教經典所闡述的義理賅天地而無外，窮宇宙之極致。佛教常把祇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稱作“大圓鏡智”；把佛教的法身佛稱作“大日如來”。所用的“大”，都是同一種含義。

“藏”，是梵文 *pitaka* 的意譯。*pitaka*，意為盛放東西的箱子、籠子等器皿。古代印度沒有紙張，經典刻寫或抄寫在貝多羅樹葉上，形成所謂“貝葉經”。印度的僧侶常把貝葉經存放在箱子或籠子，即 *pitaka*（藏）中。因此，*pitaka*（藏）也就逐漸成為佛典的計算單位乃至代名詞。比如經、律、論分別存放在三個 *pitaka*（藏）中，被稱為 *tripitaka*（三藏）。

“經”，是梵文 *sūtra* 的意譯。*sūtra*，原意為“貫穿”。古印度佛教徒認為，用一根綫繩把花瓣穿起來，這些花瓣就不會再被風吹散。同理，把釋迦牟尼的言教搜集總攝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流傳後代，所以稱之為 *sūtra*。中文“經”字原意是指織物的縱綫，有綿延之意。故引申為“常”，指常存之義理、法則、原則。《尚書·大禹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經，常。”《左傳》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①就是這個意思。中國人從來有一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認為宇宙間存在著某種終極真理。對“經”字的上述詮解，就是中國人這種心態的反映。在此，釋僧肇的解釋可能是有代表性的：“經者，

① 《辭源》，商務印書館，1981年修訂第一版，第2434頁。

常也。古今雖殊，覺道不改。群邪不能沮，衆聖不能異，故曰‘常’也。”^①意思是說：所謂“經”，是一種永存不變的東西。儘管時間流駛，古今的情況不同，但釋迦牟尼闡明的覺悟真理不會發生變化。這種真理是任何不信佛的外道（群邪）破壞不了的，即使是佛弟子們（衆聖）也不能隨便改變它。所以稱作“常（永恒）”，也就是“經”。由此看來，中國人用“經”字來對譯印度的 sūtra，雖然不符合該詞的原意，卻反映出中國佛教徒對釋迦牟尼及其言教的無限崇拜與信仰。

sūtra 一詞，在印度僅指經、律、論三藏中的“經藏”。而在中國，“經”的內涵逐漸擴展，形成不同的層次。從狹義到廣義，大體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三藏中的經藏，等同於印度佛教的“sūtra”。第二層含義指域外傳入的所有翻譯佛典。從佛教初傳開始，中國人往往把屬於印度佛教律藏、論藏的典籍，都譯稱為“經”。第三層含義，則如“大藏經”的“經”，已經進而包括了中國人自己編撰的中華佛教撰著。“經”之含義的演變，與中國人對翻譯佛典的觀感有關；與南北朝時期的三寶崇拜思潮有關；也與隨著中國佛教蓬勃發展，中華佛教撰著大量出現有關。

所以，“大藏經”一詞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內容，又融貫了中國人的思想與感情，反映了中國佛教發展的歷程，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從上個世紀起，大藏經成為佛教學術研究的對象，當時學者們曾對“大藏經”一詞最早出現在什麼時候進行過探討。由於《大正藏》本隋灌頂著《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之末尾提到智者大師一生共造“大藏經十五藏”^②，故認為“大藏經”一詞在隋代已經產生^③，筆者以

① 《注維摩經》卷一，《大正藏》，第38卷第327頁下。

② 《大正藏》，第50卷第197頁下。

③ 參見日本大藏會編：《大藏經——成立と變遷》，百華苑出版，1990年2月，第22頁。

前也持這樣的觀點。但後來在日本藤枝晃先生的提示下，細玩《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卷末文字的意趣，發現這段文字並非灌頂的原著，而是“銑法師”所作的補註。“銑法師”係何時、何許人，待考。所以不能把它當作“大藏經”一詞在隋代已經出現的證據。

在整理敦煌遺書的過程中，我發現敦煌遺書《西天大小乘經律論並見在大唐國內都數目錄》（伯 2987 號、斯 3565 號）、《大唐大藏經數》（伯 3846 號）出現“大藏經”一詞。本書第二章對伯 2987 號、斯 3565 號有專題研究，此不贅述。這兩件敦煌遺書，從抄寫形態看，應該是敦煌歸義軍時期的寫本，但從內容分析，該文獻產生的上限不會早於唐玄宗時代，下限不會晚於會昌廢佛。至於伯 3846 號，則年代稍遲，為會昌廢佛後出現的。因此，我曾經推測“大藏經”一詞大約產生在從唐玄宗到會昌廢佛這一時期^①。其後檢索電子文本大藏經，發現《金剛頂經大瑜伽祕密心地法門義訣》卷上有“其百千頌本，復是菩薩大藏經中次略也”^②的說法。該《義訣》未為我國歷代大藏經所收，日本《大正藏》依據日本刻本收入。日本刻本則源於空海入唐所得。空海入唐的年代是公元 804 年到 806 年，相當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至唐憲宗元和元年。隨後又在唐海雲《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中，發現有“依梵本譯成六卷，又總集一部教持念次第共成一卷，成七卷。共成一部，編入大藏經”^③。海雲該書撰於唐文宗大（太）和八年（834），時為會昌廢佛之前。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相互證明，由此可以肯定會昌廢佛之前，最遲在唐貞元年間，“大藏經”一詞已經產生。

應該指出，敦煌遺書伯 2987 號、斯 3565 號均有“西天大藏經有八萬四千億五百卷”之類的提法。可知創造了“大藏經”這個名詞的

① 方廣錫：《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2002 年 3 月，第 1 頁。

② 《大正藏》，第 39 卷第 808 頁上。

③ 《大正藏》，第 51 卷第 785 頁下。

中國人並沒有把這個名詞的使用局限於漢文佛教典籍，而把它當做佛教典籍的總稱。但在古代，雖然中國人創造“大藏經”這一名詞，並賦予它佛教典籍總稱的含義，其他各系統佛教，卻依然各自傳承自己的典籍，各有自己傳統的稱呼。南傳佛教的典籍被稱為“三藏”(Tripitaka)，藏傳佛教的典籍被稱為“甘珠爾”、“丹珠爾”。至於“漢文大藏經”這一名詞，實際是二十世紀初由日本學者提出的。他們站在漢傳佛教的立場上，注目於三大系佛教之總體，整合各不同語種之佛典，提出“巴利大藏經”、“南傳大藏經”、“藏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西夏大藏經”等一系列名稱。作為對舉，漢傳佛教的“大藏經”一詞也自然演化為“漢文大藏經”。所以，在漢傳佛教文化圈中，所謂“漢文大藏經”與“大藏經”，祇是不同歷史、語言背景下的不同稱呼，其指代對象完全相同。

同樣應該指出的是，“巴利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等提法的出現，祇是漢傳佛教文化圈內部的事，這些稱呼基本上祇限於漢傳佛教系統內部使用，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則仍然沿用傳統的“三藏”(Tripitaka)、“甘珠爾”、“丹珠爾”來稱呼自己的典籍。由於歐美的佛教研究是從研究南傳佛教起步的，受此影響，歐美長期使用“Tripitaka(三藏)”一詞，並用該詞來對譯漢文的“大藏經”。近年來，纔逐漸改用“dazangjing(大藏經)”這一稱謂，有的則採用“大藏經”的日語發音“taizokyo”。

上面分析了產生“大藏經”一詞的文化背景與實際內涵。本書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寫本佛教大藏經，所以本書所說的“大藏經”，如不特別指明，均指漢文大藏經。

二、大藏經的定義

在中國，人們起初用“眾經”、“一切經”、“經藏”、“藏經”等詞來

稱呼所傳承的佛教典籍，唐代纔出現“大藏經”一詞。如果仔細探究，上述詞彙的出現與衍化，反映出中國人對佛教典籍的觀感。但出現之初，它們祇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稱呼，人們並沒有仔細研究它們的定義。近代以來，隨著佛教學術研究的展開，大藏經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人們開始嘗試對大藏經進行定義。我們先看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代表性定義。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稱：

大藏經 術語。一切經從所入之藏殿（方按：“殿”，應為“典”之誤）而謂為大藏經。見“一切經”條及“藏經”條。^①

一切經 術語。佛教聖典之總名。或曰“大藏經”。省曰“藏經”。^②

丁福保定義的文字比較簡單，但“佛教聖典”一詞留有解釋的餘地。不過，說“藏經”是“大藏經”的省略，不符合歷史。事實是先出現“藏經”，後出現“大藏經”。因此，毋寧說“大藏經”一詞是“藏經”的擴展。

《望月佛教大辭典》稱：

大藏經 雜名。包含三藏等諸藏之聖典。又稱“一切經”、“一代藏經”、“藏經”、“大藏”、“三藏聖教”。即以經律論三藏為中心的佛教典籍的總集。^③

《望月佛教大辭典》定義的特點是指出大藏經以經律論三藏為

①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新1版，第215頁b。

②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新1版，第3頁a。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第1402頁c“藏經”條簡單介紹歷代藏經，無定義，故不錄。

③ 塚本善隆：《望月佛教大辭典》，第四卷，世界聖典刊行協會，昭和59年2月，增訂版，第3311頁b。

中心，亦即強調了漢傳佛教的印度之根。

二十世紀中葉，大藏經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小川貫式主持編纂的《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該書未對“大藏經”這一名詞作出定義，但有一段敘述性語言：

佛陀神聖教說的匯集，在印度稱為“三藏”，中國則叫做“一切經”或“大藏經”。……中國佛教在六朝時期，逐漸興盛。這時也興起了蒐集整理漢譯佛典、製作佛書目錄的風氣。當時的人，把匯集在一起的佛典，稱作“眾經”。六朝末，北方稱佛經為“一切衆經”和“一切經”，江南則稱為“大藏經”，有時也二者併用。這些名稱，不單祇是佛典彙集或叢書的意思，而是含有一定組織和內容的意義。特別是隋唐時代的佛教界，在漢譯經典將編入大藏經之先，都必須奏請皇帝敕許或欽定。隨著外來的佛教，在中國的國家體制下，成為中國的宗教，並佔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中文的佛典以致有欽定大藏經的那種權威與保證。^①

上面這段話勾勒了大藏經的發展的基本輪廓，雖嫌粗疏，且有錯誤，但攝意較廣。就本文討論的“大藏經”定義而言，它提到“組織和內容”這一值得注意的問題。

二十世紀下半葉與本世紀初，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在此介紹幾種比較重要的著作：

大藏經 佛教典籍的叢書。又名一切經、契經、藏經或三藏。內容包括經（釋迦牟尼在世時的說教以及後來增入的少數

^① 此書為日本大藏會編，日文名：《大藏經——成立と變遷》，百華苑出版，1964年3月。引文見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25，《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大正大藏經解題（上）》，華宇出版社，1984年11月，第5～6頁。